

藏彝走廊研究丛书

主编:袁晓文

# 李星星论藏彝走廊

李星星 著



民族出版社

藏彝走廊研究丛书

主编：袁晓文

# 李星星论藏彝走廊

李星星 著



民族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李星星论藏彝走廊/李星星著. —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6

(藏彝走廊研究丛书)

ISBN 978 - 7 - 105 - 09416 - 5

I. 李… II. 李… III. ①藏族—民族文化—研究—中国  
②彝族—民族文化—研究—中国 IV. K281.4 K281.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95944 号

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编 100013)

<http://www.mzcb.com>

北京艺辉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2008 年 6 月第 1 版 2008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21 字数：587 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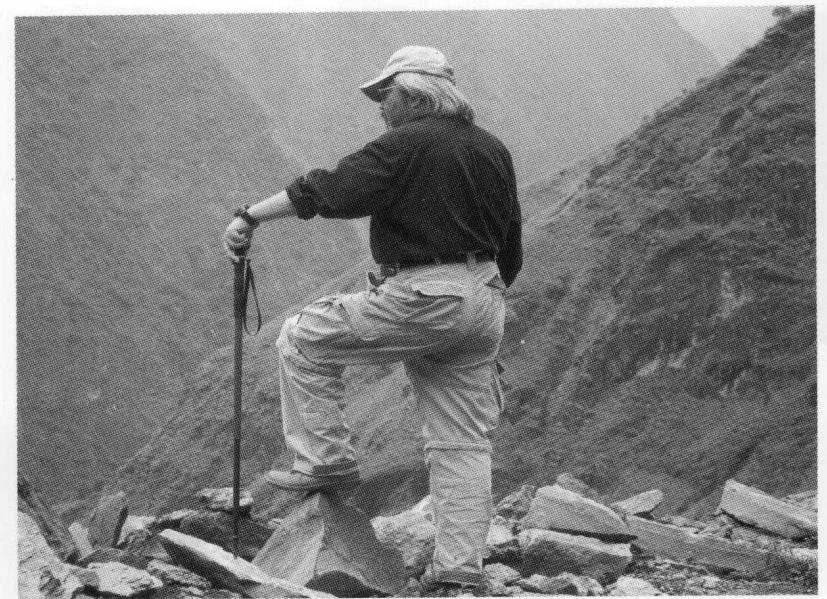
印数：2000 册 定价：42.00 元

ISBN 978 - 7 - 105 - 09416 - 5/K · 1425 (汉 623)

---

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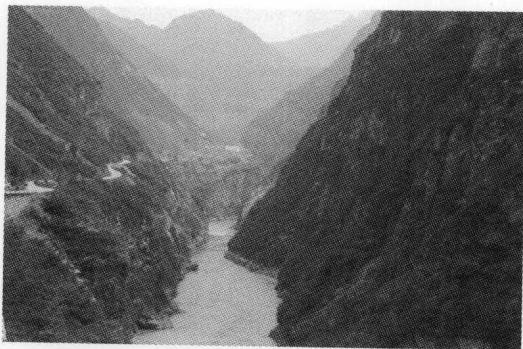
汉文编辑一室电话：010 - 64271909 发行部电话：010 - 6422478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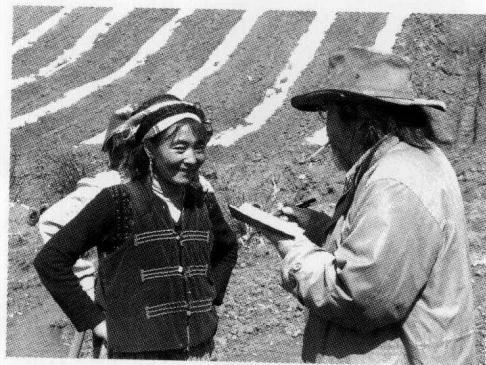
俯视雅砻江峡谷



作者在雅砻江源头地区考察，与阿日扎牧民在一起



大渡河峡谷



在小凉山路上考察路途中随机访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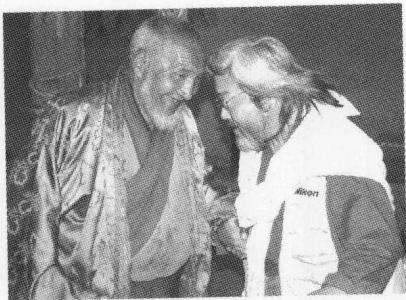
金沙江 U形湾



松格嘛呢石经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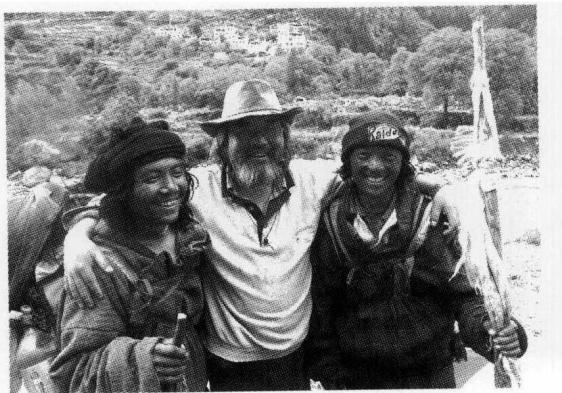
作者在岷江上游考察



作者在藏区考察与寺庙高僧施礼



作者在嘉陵江上游白马藏族地区考察



作者在藏彝走廊考察途中与藏族朝圣者

# 总序

民族学与民族史学术上的“藏彝走廊”，是费孝通先生于1980年前后提出的一个历史—民族区域概念，主要指今四川、云南、西藏三省（区）毗邻地区由一系列北南走向的山系与河流所构成的高山峡谷区域，亦即地理学上的横断山脉地区。在横断山脉地区主要有岷江、大渡河、雅砻江、金沙江、澜沧江、怒江六条由北而南的大河纵贯其间，故习惯上又称这片区域为“六江流域”。但它并非六江流域的全部，而主要指几条江的上游。具体而言，这一区域，包括藏东高山峡谷区、川西北高原区、滇西北横断山高山峡谷区以及部分滇西高原区。就行政区域而言，藏彝走廊主要包括四川的甘孜藏族自治州、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凉山彝族自治州和攀枝花市，云南的迪庆藏族自治州、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和丽江市，西藏的昌都地区等地。

在这片区域中，现今居住着藏缅语族中的藏、彝、羌、傈僳、白、纳西、普米、独龙、怒、哈尼、景颇、拉祜等民族，而以藏缅语族的藏语支和彝语支的民族居多，故从民族学而言称之为“藏彝走廊”。但在此一区域的南部，同时还居住着壮侗语族中的傣族和壮族、苗瑶语族中的苗族，乃至汉族、回族以及孟高棉语族中的一些族体。同时，这条走廊自古以来就是藏缅语族诸民族先民南下和壮侗、苗瑶语族诸民族先民北上的交通要道和众多民族交汇融合之

所。该走廊现今共有人口 1000 余万，其中有 530 余万是少数民族，其余的是汉族。

在这条走廊峰峦重叠、河谷深邃的群山峡谷中，不仅居住着若干少数民族，而且至今还保存着即将消失的被某一民族语言淹没的许多基层语言，同时还积淀着许多至今还起作用的历史文化遗存，这保留在他们的信仰、文艺、风俗、习惯等诸多方面。从石器时代起直至现在，众多民族都在此留下了自己活动的实物证据，其内容之丰富丝毫不亚于中原地区。这些宝贵资料，对于研究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我国西南地区乃至中南半岛各民族的起源与迁徙、融和与分化，以及各民族的历史、语言、社会、经济、宗教、文化诸方面均具有极大的科学价值。而这一研究同时对于我国边防的巩固、边区的开发、民族团结的增进和实现当地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亦均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 二

关于藏彝走廊研究，费孝通生前曾经作过五次阐述，是他为我国学术界所留下的一笔宝贵文化遗产。

第一次，是 1978 年 9 月，费孝通在政协全国委员会民族组的一次会议上，以《关于我国民族的识别问题》为题的发言中，首先提出了藏彝走廊的概念问题。他指出：“要解决（民族识别）这个问题需要扩大研究面，把北自甘肃，南至西藏西南的察隅、珞渝这一带地区全面联系起来，分析研究靠近藏族地区这个走廊的历史、地理、语言并和已经暴露出来的民族识别问题结合起来。这个走廊正是汉藏、彝藏接触的边界，在不同历史时期出现过政治上拉锯的局面。而正是这个走廊在历史上被称为羌、氐、戎等名称的民族活动的地区，并且出现过大不等、久暂不同的地方政权。现在这个走廊东部已是汉族的聚居区、西部是藏族的聚居区。”接着，他指出：“我们以康定为中心向东和向南大体上划出一条走廊。把这走

廊中一向存在着的语言和历史上的疑难问题，一旦串连起来，有点像下围棋，一子相联，全盘皆活。这条走廊正处在彝藏之间，沉积着许多现在还活着的历史遗留，应当是历史与语言科学的一个宝贵园地。”他还指出：“如果联系到上述甘南、川西的一些近于羌语和独龙语的民族集团来看，这一条夹在藏彝之间的走廊，其南端可能一直绕到察隅和珞渝。”<sup>①</sup>

第二次，是1981年12月，费孝通在中央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座谈会上，以《民族社会学的尝试》为题的讲话中，再次论及藏彝走廊研究的重要性并全面地阐述了他的民族走廊学说。他说：“西边从甘肃南下到云南西陲的这个走廊。历史上系属不同的集团曾在这里建立过一个或几个强大的政治势力。它们正处在汉藏之间。这几个大民族在这地区你去我来，我去你来搞了几千年。来回的历史流动，都在不同程度上留下了冲积和沉砂。所以，我在前几年曾经指出过，这是一个极值得研究的地区。”此中费先生所说藏彝走廊中历史上系属不同集团建立的强大政治势力，当主要指自唐代以来政治势力覆盖该走廊的吐蕃、南诏和大理等几大政权。这些政权在历史上都曾一度影响到整个中国发展的进程。费先生又接着指出：“最近听说西南几省的民族研究工作者联合起来一起攻关，要把藏汉之间的走廊地区进行一次调查，那是很好的。”费先生还指出：“从宏观的研究来说，中华民族所在的地域至少可以大体分成北部草原地区，东北角的高山森林区，西南角的青藏高原，藏彝走廊，然后云贵高原，南岭走廊，沿海地区和中原地区。这是全国这个棋盘的格局。我们必须从这个棋盘上的演变来看各个民族的过去和现在的情况，进行微型的调查。”<sup>②</sup> 费老对中华民族分布格局勾画出的板块与走廊，涉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与发展均具有重

<sup>①</sup> 费孝通：《关于我国民族的识别问题》，载《中国社会科学》，1980（1）。

<sup>②</sup> 费孝通：《民族社会学的尝试》，见《从事社会学五十年》，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

大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而对其研究则涉及民族学、民族史、民族关系等诸多学科的内容。为此，必须进行民族学科及其他社会学科的综合研究。

第三次，是1982年4月，费孝通在昆明由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召开的座谈会上，以《支持六江流域民族的综合调查》为题的讲话中，着重就藏彝走廊的调查研究讲述了意见。他说：“1978年那次讲话我提出民族研究要提高一步，怎样才能提高呢？我觉得今后需要进行宏观的研究，用全面的整体的观点研究各民族历史上的联系，研究中华民族形成的过程及其发展变化，研究我国这个多民族大家庭几千年里各民族来来去去不断流动的状况和趋势，不要仅限于现在的五十几个民族的研究。今后中国的民族还是要变的，不会永远是这样的，变化的方面是什么呢？社会主义民族之间关系是怎么样呢？它本身规律怎么样呢？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进一步研究。”他接着说：“根据我们30多年的经验，需要重新考虑民族研究下一步怎么搞。现在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组织六个省、区的有关同志对岷江、大渡河、怒江、澜沧江、雅砻江、金沙江这六江流域的民族进行考察，这是很好的。好就好在，第一条它打破了行政上的界限，第二条它打破了学科的界限，进行综合研究。”他再次鼓励和要求大家：“我们不要一个虚名，不要人家拍手，不要搞得热闹，要扎实地工作。现在的名声比我们实在做的超过很多，我们必须脚踏实地去做，慢一点不要紧，不要急躁，不要踏空。”<sup>①</sup>

第四次，是1982年5月，费先生在武汉社会学研究班和中南民族学院部分少数民族同志座谈会上，以《谈深入开展民族调查问题》为题的讲话中，再一次深入地阐述了藏彝走廊研究与民族走廊学说的理论问题，他说：“那个地带就是我所说的历史形成的民族地区，我也曾称它作藏彝走廊，包括从甘肃到喜马拉雅山南坡的珞渝地区。珞渝地区的民族构成，外国人搞不清楚。这里发现有水田

<sup>①</sup> 载《民族学报》（昆明），1982（2）。

技术很高的阿帕达尼。他们从哪里来的呢？我从照片上看，他们头上也有一个髻，同彝族的‘英雄髻’很相似。语言我们还不清楚，没有材料作比较研究。再下去到缅甸北部、印度东部的那加地区。这一带都是这一相似类型的民族，看来都是这条走廊里的民族，都在藏族和彝族之间的地区里。藏族是从拉萨为中心，慢慢扩大的。……假如我们能把这条走廊都描写出来，可以解决很多问题，诸如民族的形成、接触、融合、变化等。我是在1979年提出这个问题的。现在四川、昆明的同志准备开始研究这些问题了，西藏也参加了。调查的地区称作六江流域，就是长江上游金沙江等六条江；从甘肃下来一直到云南怒江、西藏的珞渝地区。这就不是一个省，而是几个省几个自治地方联合调查了。这个计划，领导上很支持，说很好。但是不容易，要做很多工作。……以上讲的，是西南的那一条走廊。”接着他说：“另外一条是中南的走廊。”当他在分析了这条走廊中的苗瑶、壮侗语族复杂的情况后提出：“广西、湖南、广东这几个省区能不能把南岭山脉这一条走廊上的苗、瑶、畲、壮、侗、水、布依等民族，即苗瑶语族和壮侗语族这两大集团的关系都搞出来。这里各种民族有其特点。山区民族就同傣语系各族不一样，今后的发展问题也不同样。”他继续谈到：“西北地区还有一条走廊，从甘肃沿‘丝绸之路’到新疆。在这条走廊里，分布着土族、撒拉族、东乡族、保安族、裕固族等等，他们是夹在汉族、藏族、蒙古族、回族中间。有的信喇嘛教，有的信伊斯兰教；有的讲藏语，有的讲蒙古语，有的讲突厥语，也是很复杂的，不容易处理。有些民族讲两种语言。上述几个复杂地区：一条西北走廊、一条藏彝走廊、一条南岭走廊，还有一个地区包括东北几省。倘若这样看来，中华民族差不多就有一个全面概念了。所以，我在一篇文章中提出来，我们需要一个宏观的、全面的、整体的观念，看中国民族大家庭里的各个成分在历史上是怎样运动的。”<sup>①</sup>

<sup>①</sup> 费孝通：《谈深入开展民族调查问题》，载《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2（3）。

第五次，是2003年11月6—8日，由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与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联合在成都召开了“藏彝走廊历史文化学术讨论会”，费老当时患病在身，他特为会议发来贺信，再次阐述了藏彝走廊研究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之间的关系及其重要意义。他在这封贺信中说：“听说11月上旬将召开‘藏彝走廊历史文化学术讨论会’，我特别高兴。我是‘藏彝走廊’概念的提出人之一。二十多年前提出‘藏彝走廊’这个概念，与我当时对自己的民族研究经历的反思是分不开的。‘藏彝走廊’上频繁而密切的族间交往在历史和现实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都早已引起民族学、人类学、民族史学界的注意，我自己在民族调查研究中初步看到，中国存在几个这样的‘民族走廊’，而‘藏彝走廊’就是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例子。六江流域天然的河谷通道，民族种类的繁多，支系复杂，相互间密切接触和交融。对这条走廊展开文献和实地田野考察，民族学、人类学、民族史学家能看到民族之间文化交流的历史和这一历史的结晶，从而能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有一个比较生动的认识。”他又说：“前些年，我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基础上，针对世界格局提出了‘文化自觉’的说法。‘文化自觉’，指的是认识和处理文化关系的一种思想方法，它追求的境界是文化之间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和而不同’。展望新世纪的民族学、人类学、民族史研究，我们能看到这些学科所承担的，正是‘文化自觉’的历史使命。在‘藏彝走廊’展开多民族地区经济文化交通的历史与文化研究，对于我们从特定地区内部认识‘和而不同’的民族文化接触历史与现状，有着重要意义，对于我们担当‘文化自觉’的历史使命，也同等重要。”最后他说：“我很高兴地看到西南地区的同事们对于这个问题给予关注，更希望看到在‘藏彝走廊’上开展跨学科研究，从深化我们对这条走廊认识的侧面，对民族学、人类学、民族语言研究和学科建设，作出

自己的贡献。”<sup>①</sup>

费老对藏彝走廊的第五次公开阐述，可说是他生前最后一次对这一问题的表达。他在此明确说明了深入研究民族走廊正是为了进一步说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问题。

费先生对藏彝走廊及其相关的问题论述，反复提出藏彝走廊研究与民族走廊学说，其目的即在于更好的阐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问题。而这一理念既整合了中华民族，又尊重了各民族个体。这对于国家的巩固和民族的团结都极为关键。因此，它既有重要的学术意义，也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 三

藏彝走廊这一概念虽然是由费孝通先生正式提出的，但在此之前早已引起国内外一些学者的注意，比如我国著名学者章太炎、方国瑜、陶云逵、任乃强等先生均对这一区域的地理环境与民族流动进行了一些研究。此中陶云逵先生即对怒江、澜沧江流域的走廊特点作出了精辟的阐述。1939年，他在《碧落雪山之粟粟族》一文中说：“怒江、澜沧江，对于东往西，或西往东的交通上是一种阻碍，但是自北往南，或自南往北未尝不是一条天成的大道，因为虽然不能行舟，但是沿河而行的便利是很引诱人的，设如我们很笼统地叙述夹着这两条河的山脉形式和方向，则高黎贡山、碧落雪山以及云岭雪山三者山脉，也多是自北而南的。这种形式，在交通方向上的便利与阻碍，和前述的河流是一样，就是便于南北，而碍于东西。”<sup>②</sup>而在外国学者中，有如法国藏学家R. A. Stein（石泰安）不

① 见石硕主编：《藏彝走廊：历史与文化》，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

② 陶云逵：《碧落雪山之粟粟族》，见《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7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48。

仅有“汉藏走廊”的提法，而且还有专著《川甘青藏走廊古部落》<sup>①</sup> 的问世。以上这些论著均为藏彝走廊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自 1978 年费先生提出这一问题以来，在全国学术界，尤其是在西南民族研究学者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1980 年，西南民族研究界筹组建立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其目的之一在于打破省区界限，进行完整的、综合的民族调查研究。1981 年 11 月，在昆明召开的川、藏、滇、黔、桂、京等省区学者参加的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成立大会暨首届学术讨论会中，与会同仁一致认为应组织社会科学有关学科学者在内的民族综合科学考察队，逐步对藏彝走廊即六江流域进行实地的深入考察。

为了推动藏彝走廊民族综合考察的实施，1982 年 3 月 15 日，我国知名学者和有关省区领导 16 人（按姓氏笔划为序）：马曜、尹达、方国瑜、牙含章、多吉才旦、任继愈、孙自强、林耀华、杨汉光、秋浦、夏鼐、徐中舒、翁独健、费孝通、傅懋勤、梁新华，联名向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胡乔木、杨静仁、江平、梅益、宦乡等书面建议，尽快开展这一工作。当即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的大力支持，使得此次民族综合考察工作能够及时展开。1982 年 4 月，费先生来到昆明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亲自对即将开展的民族考察工作予以指导，并在学会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发表了以《支持六江流域民族的综合调查》为题的学术讲演。

在费先生和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首任会长马曜先生以及老一辈学者和有关领导的关怀下，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六江流域民族综合科学考察队于 1982 年 5 月在昆明正式建立。确定由学会秘书长李绍明任考察队队长，学会副秘书长童恩正（四川）、何耀华（云南）任考察队副队长。考察队首先确定以雅砻江流域和怒江中游这两处为科学考察的试点区域。考察区域内的民族主要为藏、

<sup>①</sup> [法] K. A. Stein (石泰安) 著，耿升译：《川甘青藏走廊古部落》，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2。

彝、傈僳、纳西、傣、独龙、苗、珞巴等民族和僈人。考察的重点为这些民族的社会、经济、历史、文化、习俗、宗教及民族关系等问题。参加考察队的有四川、云南、西藏、贵州和上海等省区市有关单位的人员共 70 余人，分属民族学、民族史、民族语言、考古学、体质人类学等不同学科。当考察队组成并分赴雅砻江与怒江流域考察时，费先生又于 1982 年 5 月在武汉发表了《谈深入开展民族调查问题》的讲话，再次对藏彝走廊的考察予以指导和支持。

六江流域民族综合考察的两处试点工作，在经过 3~5 个月后，基本告一段落，形成了 3 本考察报告，即李绍明、童恩正主编的《雅砻江下游考察报告》，蔡家麒、杨毓骥编的《独龙族社会历史综合考察报告》和《滇藏高原考察报告》，均相继于 1983—1984 年内部出版。1984 年 7—9 月，考察队又组织 10 余人对雅砻江上游民族地区作了综合考察，最终形成由李绍明、童恩正主编的《雅砻江上游考察报告》，并于 1985 年内部出版。这些第一手调查资料均受到学术界的好评。

对藏彝走廊的调查研究，除了综合的民族考察之外，在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倡导和组织下主要还做了如下一些工作：

一是古代西南丝绸之路研究。古代西南丝绸之路亦称南方丝绸之路，从我国成都出发经四川西南、云南以及缅甸、印度、中亚直至欧洲。这条道路在国内所经很大一部分在藏彝走廊地区，沿途均为少数民族。以往在我国学术界对这条道路并未取得共识。经过调查研究主要形成如下成果：伍加伦、江玉祥主编的《古代西南丝绸之路研究》；<sup>①</sup> 编委会编的《南方丝绸之路文化论》；<sup>②</sup> 四川大学历史系编的《中国西南的古代交通与文化》。<sup>③</sup> 此外，1990 年初，川

<sup>①</sup> 伍加伦、汪玉祥主编的《古代西南丝绸之路研究》第一辑和第二辑，分别于 1990 年和 1995 年由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

<sup>②</sup> 编委会编：《南方丝绸之路文化论》，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

<sup>③</sup> 四川大学历史系编：《中国西南的古代交通与文化》，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5。

滇两省古代西南丝绸之路沿线 14 家文博考古单位联合举办了“南方丝绸之路文物摄影艺术展览”，并在川滇许多重要城市进行了巡回展出；1990 年 8 月，由凉山彝族自治州博物馆主办召开了“西南丝绸之路学术讨论会”；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协助川滇两省电视台联合拍摄了《南方丝绸之路》40 集系列电视片。在此带动下，西南丝绸之路的调研在各地相继开展。经过几年努力，这一研究已取得丰硕成果，而这条古道在历史上的地位与作用，已得到国内外学术界公认，并形成了今日重振西南丝绸之路的社会共识。

二是藏彝走廊各民族的语言研究。藏彝走廊各民族语言极其复杂，一种民族讲多种语言和多种民族讲同一语言的情况广泛存在，尤其是一些被称为“地脚话”的民族语言处于底层，往往为通用的语言所掩盖。中国西南民族学会组织民族语言学者对一些濒危的小语种进行了调查研究，出版了一些成果，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引起了国内外学人的充分重视。

三是藏彝走廊的诸多专题研究。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社会科学研究的重点逐步转移为应用研究，因而藏彝走廊的总体或综合的基础研究势头有所薄弱，但关于这条走廊的各项专题研究却异军突起，其成就相当突出。比如四川学术界的康巴文化研究、金沙江文化研究、牦牛经济与文化研究、禹羌文化研究、岷江上游考古发掘与研究、彝族毕摩文化研究；西藏牵头的茶马古道研究、昌都地区研究；云南学术界的纳西东巴文化研究、三江并流区域自然与文化研究、卡瓦格博雪山区域生态与人文研究等等，都具有代表性，而其成果均为学术界所瞩目。

近几年来，西南学术界为再次重振藏彝走廊的基础研究作了一些工作，发表一批科研成果，并于 2003 年 11 月在成都召开了“‘藏彝走廊’历史文化学术讨论会”。这是自费孝通先生 25 年前提出这一概念，中国西南民族学会 21 年前组织六江流域的民族综合考察以来，对藏彝走廊研究所作的第三次重大举措，也是聚集国内学者对藏彝走廊问题的首次学术探讨。这次会议研讨的成果已集结